

導論：空間之意象、實踐 與社會的生產**

黃 應 貴*

過去，人們常以具體而固定的空間，作為社會文化認同的基礎。反之，人們被迫不斷遷移，正如猶太人的離散（diaspora），被稱之為流離失所，往往披上了悲慘的色調。既使到今日，因交通及通訊工具的快速發展，以致於人、物、資訊、資金等的流通加速，使得人們的跨境與跨界的現象成了常態，「故鄉」仍然成為社會文化認同的重要基礎；即使這時「故鄉」的意象，往往是建立在一種想像上，既不真實、又不理智，卻充滿著情感與情緒。¹

雖然如此，若我們能進一步思考由人們空間移動背後的空間概念或想像所建構的空間意象，以及人們在具體的地理與地方上的實踐所創造出來的各種空間，往往相互構成了人們日常生活的空間表徵，反映了社會的現實而為社會所生產。²這意味必須將空間的意象重新放置於既有的歷史與社會文化脈絡中，也只有放回真實的時空脈絡中，特別是中國大陸與臺灣的漢人與少數民族的具體社會文化脈絡與歷史條件下，我們才有可能對於社會文化現象，因空間觀念的引入，而有新的理解。這正是本卷論文集的焦點，及其可能的貢獻之所在。這可由下列的討論進一步認識。首先，我們由空間移動的問題著手。

*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 謝謝鄭依憶對於本文所提供的意見，以及葉淑綾代為修飾原稿，在此一併致謝。

1 Strathern (1982) 所研究英國的 Elmdon 村落，已成為人類學的古典例子。這地方的人多半早已移出，當地居民大都是外來者。而且，這村落的範圍更有著開放性而模糊不清。但移出者仍以這早已是邊界不清、異質性很高的原居地，透過想像而成為他們地方認同的對象。

2 此處論點多少受到 Henri Lefebvre (1991) 的影響，但本論文集重點在於歷史與社會文化脈絡下的空間問題，而非有關空間理論的討論，故筆者有意避開了艱深的理論概念之界定與討論。

一、空間移動

本卷論文集的第一篇由賀大衛 (David Holm) 所寫的論文，便是由貴州冊亨布依人的摩公經書「開方科儀」的研究，強調即使在壯侗語系這類所謂的「原始社會」中，移動也都是非常頻繁的事，不管是個人、家族、乃至於整個聚落，在河流的上下游、甚至隔著山頭的移動，也都不斷的發生。

事實上，作者由經書中人們對於遷移過程的描述，建立他們遷移的路線與範圍。「這個路線推翻了既有在 Tai 語系人群起源研究中，認為北 Tai 語人群是由南、由東，向北、向西，進入貴州的說法。作者論證，事實上，他們的移動是來來回回，上上下下；他們不但溯水北上遷移，也沿江或輾轉從山間往下游或南方，或再往北、往東遷移」。³ 甚至「不同技術人才一如鐵匠、石匠等跨社群的移動，以及不同分工的村落，如作南粉的村落，作竹帽、草蓆等的村民在不同集市的移動，更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這些都在在說明，既有認為 Tai 語人群的擴張過程，是建立在村社的基礎之上，沒有與外來移民混同的認定，是先驗而錯誤的」。這篇論文不僅依靠一向不為歷史學者所重視的非漢語文本而避開從漢人或中國出發的歷史觀點，更「有效地挑戰了既有對於 Tai 語系社會是世世代代定居社會的想像。為充斥在既有對於中國 Tai 語系人的認定——嚴密、閉塞的村社組織、以土地為基礎的『封建領主經濟』之研究，帶來很不同的視野。更呼應高地東南亞人類學研究上，Karl Izikowitz 在 1930s 就提出的 Tai 系人群的擴張觀點，批判學者『泰化』Tai 語系人群的缺失」。這篇論文，實際上已提出中國南方的研究，需要有東南亞或其他更大區域之比較研究視野的重要性。

其實，除了因帶入空間移動的概念而對既有研究領域的成果有所挑戰與貢獻外，更對移動背後空間本身的許多相關現象，因重新置於歷史與社會文化脈絡而有深一層的理解。這可見於下面的討論。

3 本段引號內的文字，均為賀大衛論文的其中一位匿名審查人所用的文字。因精練的程度非筆者所能及，特轉引之。

二、空間意象與實踐

中國作為一個空間意象，既歷史長久而又使用廣泛。但依包弼德（Peter Bol）的論文，它包含兩個層面：歷史地點上的中國，以及文化上的中國。而近古時期的中國，是將兩者合而為一，甚至強調文化中國的重要性，使得中國與周圍的夷狄因文化的優越而有著清楚的區分，卻沒有單一的地點為中心，文化的參與超過行政上的隸屬。它反對擴張的國外政策而接受周遭外國的存在，因它否定歷史上不同的文化可以和諧地融合成單一的政體。事實上，它是存在於更大的世界關係上。後來經過外族的統治（金、元、清）而逐漸引入民族政治的分辨，但原則上還是在空間與文化的不同結合上。這與近現代建立在現代民族國家上的中國之意象意義不同。

包弼德的「中國」意象，在妹尾達彥的文章中，有著實踐層面上的意義：八世紀以來，在「異人買寶譚」裡所呈現的異人，並非完全與漢人截然劃分而來自西域的異族。但到近代，中國已成為政治地理的名詞，漢人反而成為同類意識或族群界線清楚的群體，而買寶物的異人成為與漢人截然不同的西歐人。筆者認為這兩篇論文隱含這同一的空間意象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具有的不同意義與實踐，實際上是與當時中國所屬的更大區域體系的性質之歷史與社會條件有關。中古時期的中國，是「中國」與「西域」結合成一個多元中心的區域與貿易體系，相對於近現代中國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性的貿易體系截然不同。而後者的性質本就隱含「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發展是世界性資本主義體系發展之一體的兩面」之發展趨勢在內，實有助於說明「異人買寶」反映漢族國族建構或同類意識的形成之歷史條件。

結合這兩篇論文來看，不僅可以看到空間意象與實踐間的相互構成，更可以產生由外在更大區域體系的視野來解釋歷史現象，與過去中國研究往往侷限於中國內在因素的解釋而有所不同。這樣，這兩篇論文因帶入空間的思考而有的新視野，就會如同陳寅恪因能跳脫中國自成一格的封閉體系之限制，得以對隋唐史用更大的區域（中國與西域）視野來看問題，並給予新的解釋一樣，有可能帶來更多的挑戰與突破。亦即，使中國研究得以突破中國內在因素解釋的限制。當然，內在因素的分析仍有其價值。至少，它有助於我們瞭解空間意象如何被建構。這可見於下一節。

三、空間意象的建構

在羅麗馨的論文中，透過江戶時期朝鮮通信使對日本的觀察，說明其對日本景觀的空間意象。在自然景觀的部份，如地勢、山脈、湖川、平原等，主要是透過朝鮮半島的大陸風光對比日本的島國所產生的違和感、以及中國明朝人對日本看法的影響來呈現。至於日本的人文景觀，如三都（包括地理形勢、城池結構、都市規劃、市容景象）、名刹、史蹟、渡河、特殊體驗與景觀（地震、觀音寺、水車、甘藷等），主要是以儒家的世界觀來看，故喜談論性理之學，較少注意「利用厚生」的問題，由此並產生日本不及朝鮮之感。但在談特殊體驗與景觀時，有意無意地以相異對比的方式來理解。換言之，在這個案中，我們看到對於新的地理景觀之認識所建構的空間意象，往往依據當事人原有文化（儒家的世界觀及明朝人對於日本的意象）的觀念外，也依一些普遍性的認知原則（如相異對比所產生的違和感）而來。這不僅讓我們得以進一步理解空間的意象如何被建構，也讓我們理解到普遍原則與特殊原則不可偏執的道理。當然，這篇論文另一層面的價值是透過韓國看日本，其實也是透過地理空間的擴大，結合中、日、韓等國族史的交互研究，朝向東亞史的研究領域來開展。

不過，羅文之所以能夠由空間意象來討論其建構的文化觀念基礎，文人擅長的見聞記錄，是有其方便之處，也容易看到既有的空間與文化觀念的優先性影響。但對於一般不擅長文字或概念的平民百姓而言，對於文化傳統的意識較隱晦不清。他們反而多半是透過空間的實踐過程，突顯他們對於空間及文化觀念的理解與再現、甚至改變或創造了新的空間意象。這可見於下一節。

四、空間的實踐與意象的改變或創造

由林開世這篇有關宜蘭五結鄉繞境的研究論文，我們發現它一反過去這類宗教儀式研究趨於社會控制論的觀點，透過繞境實際的實踐過程，強調神像與人或身體的能動性，突顯身體本身的參與與儀式互相建構、互相參照，構成了具有定義及定位儀式的權力階序與社會關係。尤其繞境儀式路線一直

有所爭執與改變，使得參與者得有抗拒、挪用、與再解釋該儀式的能動性。如此，不僅可以一再改變原繞境所要確定的神明管轄範圍的空間意象、以及以身體實踐來建構空間意象的一般趨勢外，更有效呈現在這個原因漢人與平埔族混居而造成界線不確定而有彈性的社會單位之儀式的特色，同時也批判了過去繞境研究缺少更進一步分析而簡化了儀式要素之作用與意義的限制。

不過，最容易突顯因空間實踐而改變空間意象者，實見於李豐楙論文的跨境與跨界的例子。他發現代巡儀式在福州與臺灣、江西吉安、東南亞三地，在儀式結構、儀式性器物（船）、文化象徵（代巡與跨境）上，因共同的神話基調或送瘟儀式的道教科儀而有其共有的文化結構。但另一方面也突顯了因地制宜而造成的變異。以載具的船為例，若福州和臺灣的王船為正型，吉安的船畫及東南亞的九皇爺船則為亞型或變型。事實上，吉安或江西型是正一派道士的分佈區，其不同於其他地區代巡儀式的主要特色是在於「喊船」，那是以宗族來主導儀式實踐的部分，這不僅反映了宗族在該地區地方社會的實力，更是代巡儀式在當地因實踐而有的創造結果。同樣，移民東南亞而散居於馬來人、印尼人「番」地上的華人，結合九皇信仰而來的代巡儀式之實踐，除了九皇爺船外，特別注重持齋的齋戒及會黨的服飾，更是面對當地伊斯蘭教齋戒及遺民對「天朝想像」的實體化結果。⁴ 這些正說明因不同空間的實踐而改變或創造了儀式空間的意象與意義。然而，這篇論文最大的貢獻與挑戰，反而是對於James Watson儀式標準化或一致性看法，提出文化主觀的詮釋。認為來自於跨境的空間想像與轉化的結果，就如同送船下水想像為送瘟離境，實結合了真實與幻想或王道意識與神道意識的想像。而不同的變化如空間的五方位與時間的五節、三十六聖數、十二行等數字間因地制宜與需求而來的轉化一樣，更涉及上一節空間意象建構或創造的文化基礎。

由於李文本身重點在於共同性或一致性上，對比之下，林瑋嬪的論文更容易突顯實踐對於空間意象的建構。林文是透過頭港村一百多年來的發展過程，說明不同時期當地外移者成功後，如何回到村子興修祖厝、祖墳及陰陽堤，來呈現成功者的社會地位，並將其現世成就轉換為恆久的文化價值之現象，實是建立在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空間分配、聘僱方式與文化空間等概念

4 當然，作者並沒有全然確定是當地伊斯蘭教齋戒期的直接影響。終究，齋戒原就是中國舊有的習俗。只是，在中國沒有那麼強的集體性與普遍性。

上，來塑造他們的故鄉意象。作者並進一步由當地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條件下，成功者不再把原家鄉視為家鄉而是藏寶庫，來突顯其文化上的改變或斷裂。就目前有關這類還在發展中的新現象與新議題之描述與討論，這篇論文有其引發學界重視及進一步討論的功勞與貢獻。尤其與當地歷史過程結合分析，使這篇論文得以承載更多層的意義。

不過，這三篇論文均涉及到同樣的問題：五結鄉的繞境、臺灣南部的燒王船等儀式的展演，固然已與地方或文化產業結合一起，而頭港村更由故鄉的意象轉變為藏寶庫。事實上，這類儀式活動的復興與壯大，幾乎是觀光或文化產業發展下的產物，或者說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下的產物。很容易讓我們看到儀式的商品化及物化現象而難感覺到其宗教性。這樣的儀式實踐，還可以稱它為宗教儀式？換言之，儀式實踐所創造出來的空間意象，在新的政經脈絡下，仍是神聖空間？這個問題在下一節有關流動空間的討論中，將更突顯。

五、流動與混和的空間

胡家瑜的論文試圖由賽夏族過去在充滿著人群互動及文化流動與混和的邊界地區生存，因而發展出變動敏感性很高的文化特性，使他們不以固定的地方或特定的地景，作為認同或聯結過去記憶的主要焦點。他們反而是動態地以「可移動的器物或可複製的具體行動延伸傳遞。……這也說明為何賽夏人對於機動性較高的文化符碼、象徵器物或儀式展演行動，賦予了多重豐富的社會文化訊息和神聖的禁忌規則」。這論點實則意味著賽夏族在當下因觀光消費的發展使當地地景明顯改變時，並不影響他們的文化認同或聯結過去記憶的方式。如此不僅可修正一般理論無意中強調以固定空間作為文化或族群認同的觀點所造成的限制而有其獨特的貢獻，更可突顯賽夏族特殊的歷史經驗與文化特性。

然而，正因為賽夏族的矮靈祭與文化觀光產業結合得更緊密，加上賽夏族位於屬於新竹科學園區後花園的南庄地區，其儀式商品化、物化的程度，遠較上一節所提五結鄉的繞境、南臺灣的燒王船、乃至於頭港村的故鄉意象，更具消費文化的色彩。這些儀式展演是否還具有傳統宗教儀式的意義在內？更加備受質疑。這個問題可以由龔卓軍的論文得到啟發。

龔文固然指出空間轉向是當代法國哲學的趨勢而為這本論文集以空間為討論的焦點，做了一個知識上的定位。其討論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異質空間」及「異托邦」概念，正確指出當代正在發展的普遍現象與問題，並進一步說明異托邦空間的六個原則：為過渡場域、不同時期有不同的作用而使其意義成為浮動的、同一空間重疊很多不同的場址、可打開不同的時間向度、有其開 / 關系統與隔絕 / 穿透裝置、以及為構成或界定的來源與中心。是以，異托邦成了當代映照出正常場所的場所。它不僅是一種可見性的社會裝置，使得主體成為主體，更形構成為某種看世界的方式。因新科技提供了更多的方式結合真實與想像來創造意象與知識來認識及建構世界，使空間的概念已經不再是「同質的、空泛的，而是滿載著幻念、日夢與吾人的激情，這樣的空間有時如風之輕盈、氣之純淨、火之透明，有時如深潭之模糊難測、樸石之冥頑生硬、春泥之團塊沾黏；又或者高聳入無邊天際，亦或潛伏於千澗深淵；或流動如溪水、或遲滯如岩壁、凝結如冰晶」。這也使該論文前半部所討論巴舍拉《空間詩學》有了新意，因他所追求的「文學意象的哲學」，正是討論創造性的想像與想像所生產的意象問題，觸及了當代文化的主要現象，而不再是作者所質疑那樣無法面對現代世界最嚴重的歷史處境問題。

其實，當代嚴峻的歷史處境，正如 2008 年世界金融風暴一樣，固然是新自由主義全球性發展的產物，而資本主義自 1970 年代末期以來的新發展更使得文化早已變成了一種資本，文化資產變成了文化產業，觀光化、異國情調化、商品化、乃至於物化等，也早已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的世界性發展而成為世界性的普遍現象。⁵ 誠如 M. M. Bakhtin 用來描述當代「節日慶典」（festival）所具有的「眾聲喧嘩」（carnavalesque）的情形一樣，神聖空間早已重疊了觀光旅遊及個人在當代情境下各種感官上滿足的需求。⁶ 上述不同於過去傳統宗教性的活動，需要的不是對於宗教的否定，而是新時代下對於宗教的重新認識。⁷ 換言之，這種龔文所稱的「混搭」現象，本就是當代社會的產

5 有關新自由主義經濟或秩序的一般特色，特別是有關文化資本與文化產業，可參見黃應貴（2006, 2008）。

6 這跟新自由主義秩序下，個體與自我被擴大到極點有關，已涉及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所說的個人圖騰所隱含的極端個人主義時代的「宗教」（Durkheim 1995）。事實上，相對於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全球性開展，自 1970 年代末期開始全球性發展的靈恩運動或基本教義派宗教活動，均摻雜著極濃的感官作用。

7 參見 Michael Jackson（2005: 104）對於當代儀式化的質疑與反省。

物。這便涉及下一節的問題，社會的生產。

六、社會的生產

除了上兩節提到異質空間或異托邦是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當代最突顯的現象外，吳雅婷的論文論及相對於唐或元明清，宋代類書旅行類的突顯，不只已達日常的程度，重要的是由宋代類書旅行類進一步的探討，可知其不僅由仕轉旅，其精巧化的發展結果更突顯了其對人際關係、旅行活動、情懷心緒的關懷，乃至最後為「無著」的行旅氣息所籠罩，實反映了當時南宋社會變動不定感的波動。雖然，作者對於空間移動所流露的不安、焦慮，是否可對應整個時代、社會的實際局面仍有所保留。但這問題本身還是隱含當時空間移動（旅行）的可能意義，必須置於當時的歷史與社會文化脈絡、乃至於更長的歷史流變中來瞭解，正說明這樣的空間類別或概念、乃至於空間意象，實是社會的生產。這裡所說的生產，不只是消極地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更是積極地加入當時社會的建構與創造。

事實上，這本論文集主要不同於另一卷文學類之處，就在於有意將空間移動背後有關空間的概念或意象乃至於實踐，重新放回既有的歷史與社會文化脈絡中，自然也使得空間為社會所生產的論點，有意無意間成了所有論文的關懷，也成了本書的特色。

七、結 論

最後，綜合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明確地說，空間移動背後有關空間各種現象的引入，讓我們對於個別的研究領域，有了新的視野與貢獻。像賀大衛論文強調壯侗語系頻繁的移動，挑戰了既有對於中國 Tai 語系人的認定——嚴密、閉塞的村社組織、以土地為基礎的「封建領主經濟」之研究，帶來不同的視野；而包弼德與妹尾達彥的論文，更因放置於更大的區域體系中來解釋歷史現象，讓我們得以跳出過去中國研究往往侷限於中國內在因素之解釋的限制。至於羅麗馨論文所突顯人們如何透過原有文化觀念與價值及普遍性的認知原則，來理解及建構新地理景觀（日本）的空間意象，說明了歷史的理解與解釋，普遍與特殊原則的不可偏執。其他如林開世、李豐楙、林

瑋嬪的論文，共同說明了空間實踐建構空間意象的重要性外，林開世論文更打破過去繞境研究的社會控制論之限制，林瑋嬪的論文則提醒了我們新自由主義秩序下有可能導致文化斷裂的問題，以及李豐楙論文透過文化的主觀觀點來解釋中國儀式的標準化或一致性，均在其個別研究領域中各有其個別不同的貢獻。胡家瑜論文修正了一般理論無意中強調以固定空間作為文化或族群認同的觀點所造成的限制而有其獨特的貢獻，吳雅婷論文則由一個不起眼的旅行類類書的討論而隱含空間的社會生產問題，在在說明空間觀念引入所具有的效用。而龔卓軍論文則為空間課題定位並為當代的現象爬梳出一個可能的理論思考方向，突顯了哲學思辯「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為所有學術討論中不可或缺的。這些論文因引入空間概念而在不同研究領域能有其獨特的貢獻，更說明空間，正如時間，是瞭解人類現象的基本且重要的因素。

引用書目

- 黃應貴 2006 〈農村社會的崩解？當代台灣農村新發展的啓示〉，《人類學的視野》，臺北：群學出版公司，頁 175-191。
- 黃應貴 2008 〈存在、焦慮與意象：新自由主義經濟下的東埔地方社會〉，「文化創造與社會實踐」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8年11月7-9日。
- Durkheim, Emile (Translated by Karen E. Fields). 1995[1912].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Jackson, Michael. 2005. *Existential Anthropology: Events, Exigencies and Effects*. Oxford: Berghahn Books.
- Lefebvre, Henri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 Strathern, Marilyn. 1982. "The Village as an Idea: Constructs of Villageness in Elmdon, Essex." In A. P. Cohen ed., *Belonging: Identit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British Rural Cultur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p. 247-277.